

# 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

——炎黄学叙论

尹全海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炎黄学属于炎黄记忆的研究范畴,与中国传统学术一样,先有学术之实而后有相应的学术之名。炎黄学之名,为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和最新形态,从炎黄记忆的物像化、仪式化到学科化,炎黄学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谓新时代的新学问。炎黄学以炎黄这一标志性记忆符号在生成、演变或传播进程中孕育出的炎黄记忆文本及其生成记录(炎黄学之实)为研究对象,如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子孙、炎黄遗存、炎黄祭典等。炎黄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时,方可称之为学。同时,对生成史的叙述、研究对象的界定,形成与研究对象性质相应的研究方法、拥有基础性资料积累、标志性专门著作和体系化的课程设置,同样是炎黄学称之为学科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炎黄学;炎黄记忆;炎黄记忆传统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8)03-0067-011

学术生成是一个民族思维观念的升华。西方文化习惯抽象思维,其学术生成往往是先有学术概念,然后涵养固化、形成规范;中华文化崇尚经验与积累,先有学术之实而后有相应之名的现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学术史上,“魏晋玄学是如此,八九百年后的宋明理学同样也是如此”<sup>[1]64-65</sup>,炎黄学之生成亦如是。2017年12月23日,“炎黄学学科建设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国国学中心召开,会议首度提出炎黄学概念,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五千多年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建构进入学科化阶段;而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的炎黄传说,早在炎黄时代即孕育而成。本文以1987年王仁民在河南郑州黄河游览区发起“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的倡议”为叙述起点,以1991年成立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其开展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为主线,追记炎黄学之生命史过程,建构炎黄学的研究对象,进而就炎黄学的学科性质与特征、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炎黄学的课程体系、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概而论之,从而形成炎

黄学之名、炎黄学之实和炎黄学之学三个核心议题。

## 一、炎黄学之名

炎黄学属于炎黄记忆的研究范畴。炎黄学之名,为五千多年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和最新形态,或称之为“被发明的传统”<sup>[2]1</sup>。炎黄记忆的物像化、仪式化和学科化,可大致视为改革开放以来炎黄记忆传统建构的历史进程,演进脉络清晰可见,可谓学有所本。

### (一)炎黄记忆的物像化

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建构,源自1987年5月河南省郑州黄河游览区党委书记王仁民在新加坡、韩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时,有感于海外华人心系祖国,以炎黄子孙为荣,遂发起“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的倡议”。同年10月21日,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新闻发布会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举行,郑州市副市长刘源任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主任,并发表讲话。<sup>①</sup>由于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的倡议很快得到国家领导人、国内知名人士、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北京、广东等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

**收稿日期:**2018-0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8@ZH00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S077);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2017SJGL091)

**作者简介:**尹全海(1963—),男,河南遂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原根亲文化、移民史及海峡两岸关系史研究。

应<sup>[3]206</sup>,因此全国性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于1988年12月21日在北京成立。会议通过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章程》、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组成人员及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关于筹资奖励暂行办法》,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委员会挂靠国家旅游局。1990年1月4日,国家旅游局向民政部行文“关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委会挂靠国家旅游局的报告”<sup>②</sup>时,民政部建议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文化部为业务主管部门。同年8月24日,民政部下发《关于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批复》,批复称:“经审核,该研究会已具备全国性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同意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sup>③</sup>王仁民、刘源、萧克为发起人。研究会下设学术委员会、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2个专业委员会和宣传、组织、联络、秘书4个办事机构,其中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设在河南。1991年5月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薄一波、萧克、程思远、雷洁琼及在京的专家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各省市代表4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章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及理事单位名单。会议推举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程思远等21人为副会长。依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章程》,“在郑州黄河游览区筹建象征中华民族、凝聚炎黄子孙情感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作为研究会三大任务之一。<sup>④</sup>1991年6月1日,在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基础上成立的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河南省民政厅注册登记。随后,湖北省、福建省、广东省、上海市、黑龙江省、天津市、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炎黄文化研究会相继成立。

1987年10月,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成立之同时,还在黄河游览区成立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征稿评委会,并以黄河游览区榴园接待厅南侧一条高5米,宽4米,长30米的百余平方米窑洞,作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雕塑室。在跨越5年时间,历经600多位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第10次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设计定稿鉴定会于1991年3月17日在郑州黄河游览区召开。鉴定会一致通过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设计,“以山造像,与群山、黄河浑然一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理念,增强了宏伟高大的纪念性效果。定稿还运用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处理上下五千年的时空关系,成功塑造了人文始祖的高大形象,基本

体现了最初的设计理念。3月22日,王仁民带着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定稿录像带,前往北京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总会及全国城雕领导小组刘开渠、王克庆、钱绍武等专家汇报。4月5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复函,同意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的规划、设计、建筑、造型、选址、立项等一切问题均由河南省决定。5月9日,郑州市计划委员会批准“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立项<sup>⑤</sup>。郑州市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指挥部于5月26日宣布成立。郑州市计划委员会分别于6月6日和8月20日批复了炎黄二帝工程指挥部提交的“关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关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初步设计”。9月12日,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奠基仪式在郑州黄河游览区向阳山前隆重举行。2007年4月18日,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郑州黄河游览区落成,从动议到工程最终完成历时20年。至此,坐落在河南省郑州黄河游览区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作为现代人造物像,如同历史上形成并保存至今的炎黄遗存一样,<sup>⑥</sup>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炎黄记忆文本。

## (二)黄帝记忆的仪式化

在1987年王仁民发起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倡议3年后的1990年,新郑市文物工作者乔志敏依据《河南总志·古迹》《河南通志·古迹》《新郑县志·古圣人物》等明清地方志书提供的线索<sup>[4]15-16</sup>,在位于新郑北街轩辕故里祠古屋西配殿南墙上意外地发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刻《重修大殿碑记》,文曰:“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迹,乃当年故址。”乔志敏据此出版《黄帝故里》一书,认为古今文献所记轩辕之丘就是今日的新郑,由此启动了炎黄记忆的仪式化进程。

1992年10月6日至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新郑县(现新郑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讨论会”在河南省新郑县(现新郑市)召开,新郑轩辕故里的学术认证工作由此展开。在为期3天的大会发言中,专家们分别从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以及姓氏源流等学科,就炎黄文化的概念、炎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的关系、黄帝故里地望及炎黄族属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特别是关于“轩辕黄帝故里的认同”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古典文献中关于“黄帝生于轩辕之丘,都有熊,其地望在新郑县的记载是可信的”<sup>[5]3</sup>。由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为本届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周谷城向大会发来贺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表讲话。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韩劲草在讲话中,不仅重申了新郑是“轩辕黄帝故乡”,而且将这一论断与在黄河游览区兴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联系在一起<sup>[5]</sup>5-12。“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使新郑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故里”,变成了“黄帝故里”。

1998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郑古都与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新郑市隆重召开。大会开幕前,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率领来自海内外120多位与会学者,到新郑市轩辕故里拜祭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26位学者的大会发言主要集中在黄帝文化与郑、韩故城及其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地位。其中,徐顺湛的《黄帝都有熊在新郑》分别从文献记载、黄帝活动遗迹、民间传说、姓氏起源及历代碑刻诗文等方面,论证以河南新郑一带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应该是黄帝族的起源地、发迹地、建都地和古代文明的肇始之地。刘文学的《黄帝族探源与中华第一古都》认为,既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从轩辕黄帝开始的,则轩辕黄帝在新郑所建之都,应该是中华第一古都。新郑市市长李和平的主题报告,从文献记载、口碑传说、考古资料等方面论述了新郑不仅是春秋战国时代郑、韩两国的故城,而且还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的故里与建都之所,因此,新郑是中国最古老的都城<sup>[6]</sup>。

2005年,河南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会会长戴松成建议,将始于1992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新郑县(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炎黄文化(新郑古都)与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新郑县(市)主办的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进行整合、定位和提升,<sup>②</sup>并对新郑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年的黄帝文化和3000年的郑韩文化进行选择性的开发。首先,为区别全国各地举办的炎黄文化活动,将炎帝文化、黄帝文化分开,主打黄帝文化,突出黄帝故里;其次,把祭祖和拜祖分开,通过举办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陕西黄帝陵的祭祖活动区别开来<sup>[7]</sup>49、35。河南省委接受了戴松成的建议,决定于2006年3月31日(农历三月三日)在新郑黄帝故里举办丙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此后,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新郑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从而恢复了历史上自古就流传的“三月三,拜轩辕”民俗。2008年国务院确定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编号:480X-32)。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成为国家祭典,实现了炎黄记忆的

仪式化和常态化,与历史上形成且保存至今的炎黄祭典活动仪式一样,成为改革开放新时代另一种炎黄记忆文本。<sup>③</sup>

### (三)炎黄记忆的学科化

2017年12月23日,炎黄学学科建设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国国学中心举行,会议首度提出炎黄学学科概念。会后,根据信阳师范学院宋争辉书记的大会致辞和与会专家发言整理而成的《炎黄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学科》(以下简称《炎黄学》)一文,就炎黄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炎黄学的研究内容、炎黄学的学科体系等学科建设基本问题发表一家之言,<sup>④</sup>标志着炎黄记忆的当代建构,由物像化、仪式化,进入学科化建设阶段。

关于炎黄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炎黄学》认为“炎黄学是炎黄文化研究的提升或升级”,是“新时代炎黄文化研究的学科新形态”,是一门兼具综合性、跨学科特征的新兴人文学科。通过建构炎黄学,推动“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实现国学(炎黄文化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sup>⑤</sup>因此认为“炎黄学”学科建设,对提升炎黄文化研究是一件大事,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创新性举措。

关于炎黄学的研究内容。《炎黄学》认为:“炎黄学是以上古时期的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人文始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因此,炎黄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包括五个层面:一是对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炎黄时代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炎帝、黄帝是炎黄学的基本学科对象;二是对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人文始祖群体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弄清楚“炎黄二帝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的,是怎样成为我们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的”;三是对炎黄后裔的代表性文化进行研究,包括炎黄文化与孔子思想的关联性,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炎黄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四是对以炎黄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的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不仅要厘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即从炎黄到华夏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是怎样血脉贯通、绵延发展的,更要关注炎黄精神是如何成为中华精神的核心并影响中华民族的;五是炎黄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实践应用研究,炎黄学能否推动炎黄文化研究于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要看能不能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sup>[8]</sup>。

关于炎黄学的学科体系。《炎黄学》认为,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通过学术研究、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使炎黄学既进入

文化系统,又进入学科体系,最后进入教材体系”,融“知识体系、研究体系、教学体系”于一体。其中,《炎黄学概论》的编撰是炎黄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建设的关键点。为此,炎黄学研究团队于2018年2月4日在信阳师范学院举行“炎黄学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炎黄学公开课备课会”。计划在信阳师范学院先期开设包括“绪论”“黄帝族发祥地、迁徙路线及活动区域”“炎黄学古典文献概述”“炎黄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等“炎黄学公开课”,希望据此形成《炎黄学概论》大纲。根据炎黄学研究院学科建设规划,除近期开展炎黄学公开课教学、编撰《炎黄学概论》外,编纂《炎黄文献集成》、建设“炎黄文献数据库”,也被列入炎黄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下一步计划中。

自1987年10月21日筹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新闻发布会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举行,至2017年12月23日“炎黄学学科建设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国国学中心召开,30年间,先是在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进程中诞生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后是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在河南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长河南岸的同盟山落成,实现了当代炎黄记忆的物像化。与此同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的第2年,即与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新郑县(现新郑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讨论会”,开启新郑轩辕故里的学术认定活动,最终使新郑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故里”,成为“黄帝故里”,为“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并以“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推动炎黄记忆的仪式化进程。2017年最初发起炎黄学学科建设的核心成员,仍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核心成员为主,<sup>①</sup>而且建构之初的炎黄学学科性质与研究取向、研究内容、学科体系,以及“炎黄学系列公开课课程”设置等,基本上属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业务范围”。<sup>②</sup>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不仅在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建构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性作用,而且与炎黄学学科的诞生地河南省结下了不解之缘。

## 二、炎黄学之实

炎黄学概念诞生于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建构。但炎黄子孙把炎黄作为标志性记忆符号而从事的记忆活动,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即开始,并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相继孕育而形成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子孙、炎黄遗存、炎黄祭典等记忆文本,应属于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即炎黄学之实。换言之,炎黄学以炎黄这一标志性记忆符号在生成、演变或传播

进程中孕育出的炎黄记忆文本及其生成过程的记录为研究对象。

### (一)炎黄传说

世界上早期发展的各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在文字出现之前所有民族都有一个漫长的传说时代<sup>[9]19-20</sup>。以口头叙事保存至今的关于炎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的历史文化<sup>[10]</sup>,称之为炎黄传说。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炎黄传说首先是广义的传说,涵括神话、传说、故事或诗歌等多种体裁。炎黄传说的内容,一部分是关于炎黄及炎黄时代历史文化的原生形态炎黄传说,包括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如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活动)和尚未经考古证实(如“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更多的是历经附会、添加而成的衍生形态炎黄传说<sup>[11]70</sup>,如“神农下凡”“神农抱太阳”的神话、黄帝与节节草传说、蚩尤智斗饿虎的故事等。在被考古发掘印证之前,未经证实的关于炎黄及炎黄时代史实(历史背景)的原生形态炎黄传说,属于“史书没有能够记载的历史”。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或不是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史实(历史背景),而是后人表达对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尊崇与景仰,而附会或嫁接到炎黄及炎黄时代,保存至今;或是后人为保存炎黄及炎黄时代的记忆,而把所闻所见的生动故事、幻想性情节添加(附会)至炎黄及炎黄时代,流传至今。由于史实的添加或嫁接,使炎黄传说更加真实可信;更因后人所闻所见故事情节之生动,炎黄传说得以记忆、传承至今。其间,普通百姓往往是生动故事或幻想性情节的创造者,知识精英则是历史背景或历史知识的传播者。如此屡经时代附会、添加“层累地造成”,并流传至今的衍生形态炎黄传说,可谓之“依然活着的历史”。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因后人的附会与嫁接,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不同时代添加或附会而成的炎黄传说,其内容带有抹不去的时代痕迹;不同区域流传的炎黄传说,则隐含着浓厚的区域文化特色。比如,“近现代民间传说的炎黄形象,以及近现代人所讲的炎黄传说,不能不流露现代意识”<sup>[11]84</sup>。湖南人讲的炎黄传说,必然会带上湖南人的风味,肯定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炎黄传说。不然,难以保存或流传至今。

无论是“史书没有能够记载的历史”,还是“依然活着的历史”,炎黄传说大多属于民间性知识或地方性知识,其最大功能在于以口头叙事保存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是五千多年炎黄记忆传统的最初记忆文本。因此,若要挖掘或搜集到更多、更生动

的炎黄传说,首先需要研究者“眼光向下”走进田野,进行民间访谈、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民间文献)整理工作。通过走进田野、走进民间,结合炎黄传说之场景,体悟炎黄记忆的历史进程、空间进程及其所表达的意义。其次在研究取向上,应当尽量回避历史学的客观性追求,而借鉴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关注“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什么,如何记得,又为什么要记得,以及人们如何将过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sup>[12]25-31</sup>,从中揭示炎黄记忆的当代建构与炎黄记忆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 (二)炎黄文献

炎黄文献是指先秦至清代传世文献中有关炎黄及以炎黄为代表的炎黄群体(如蚩尤、嫫祖、仓颉等)及其活动史迹的记录,由古代典籍、地方志书和姓氏谱牒三部分组成。古代典籍所载炎黄记忆,初见于战国前期,多为后人对炎黄传说的记录、整理或误传。故炎黄文献以先秦为主,延及清代,唐宋之后的文献多为辑佚、类编等,有些可能是假托黄帝之名而作。据目前所见存世炎黄文献,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周易》《竹书纪年》《山海经》《大戴礼记》《尸子》《管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白虎通义》《帝王世纪》《通志》《皇王大纪》,以及托炎黄命名之《黄帝内传》《黄帝文玄女兵法》《黄帝内经》《神农书》等。炎黄文献之古代典籍部分,亦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列。地方志书中所见的炎黄记忆,除历史上著名志书,如《华阳国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之“艺文志”“舆地志”“古迹志”外,更多的历史信息,应从炎黄英雄群体主要活动区域的地方志书中细细采撷。这些区域有已知的炎帝故里陕西宝鸡、湖北随州等;炎帝归葬地湖南炎陵;黄帝故里河南新郑、归葬地陕西桥山等;炎帝、黄帝、蚩尤共同活动的河北涿鹿等地。因此陕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5省古今地方志书是炎黄文献的重要来源。如河北《宣化府志·古迹》(乾隆)《涿鹿县志·黄帝文化》(1994年版)、河南《新郑县志·古圣人物》(康熙)《宝丰县志·艺文》(道光)、陕西《中部县志·黄陵志》(1944年版)、《黄陵县志》(1995年版)、湖北《随州志·山》(同治)和《随州志·艺文》(同治)、湖南《酃县志·炎陵》(同治)等。至于姓氏谱牒文献,除先秦史籍《世本》、唐人林宝纂《元和姓纂》、宋人罗泌撰《路史》及郑樵编纂《通志·氏族略》等谱牒著作中有关炎黄及炎黄时代史实记载外,更为详细的炎黄裔承关系的信息应来自与炎黄及炎黄群体有密切关系的“上古八大姓”“黄帝十二姓”和“祝融八姓”及其后裔族谱。

炎黄文献之研究,主要运用中国传统史学之方法,涉及历史考证、历史叙述和历史阐释三个层面或环节。按照事实考证和文献考证的先后顺序,先进行事实考证,确认传世文献所载内容为炎黄文献,然后进行文献考证,确认炎黄文献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从中发现是谁创造了这些文献、又是何时创造的。在历史叙述环节,按照炎黄文献成书年代先后排列,追溯炎黄文献之源流,确认什么人收藏、使用了这些文献。历史阐释环节可参考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基本理念。先按照炎黄文献所记内容发生的时间进行排列,建构成炎黄史迹,再与炎黄文献的成书时序进行比较,辨识炎黄文献生成和流传过程中叠加的信息及其他历时性知识<sup>[13]513</sup>。

## (三)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作为一个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其核心意蕴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已初露端倪。据记载,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皞,邠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楚、夔出于祝融、熊,春秋之前部族之间并没有公认的始祖<sup>[14]202</sup>。到了战国时期,史书有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sup>[15]8</sup>这表明此时对有虞、夏、商、周崇祀黄帝之祭典已有明确记录。《世本·帝系篇》《世本·氏姓篇》等篇,开始列出黄帝后裔谱系,以及黄帝与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之间的裔承关系<sup>[15]15-18</sup>。西汉司马迁作《史记》,首书黄帝,重在一统世系,民族一元,从此华夏各族始祖有了先后顺序。《史记》叙事在描摹、型塑秦汉帝国情景本相之同时,也有巩固与维护秦汉帝国情景结构之功能,因此持续影响后世<sup>[16]214-218</sup>。据此,由炎帝、黄帝两个氏族组成的华夏族群,当为秦汉间所称中国人的三个重要来源之一<sup>[9]39</sup>,华夏族群亦为此时炎黄子孙的核心意蕴。公元前206年汉朝代秦而兴,此后400年间,原本活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华夏族群之后裔,与位居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东夷族群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苗蛮族群之后裔,在相互交往中实现族群融合,共称之为汉人,并为此时炎黄子孙的核心意蕴。进入20世纪,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接续《史记》叙事,将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中华民族<sup>[17]65</sup>。至中华民国肇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包

括汉族在内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同组成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因此成为20世纪以来炎黄子孙的核心意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不断强化,至此,中国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几乎同义。

炎黄子孙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文献意义上的炎黄子孙,自春秋战国或有托称炎黄后裔者,至20世纪30年代,凡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得到国人认同,凡三千多年。炎黄子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核心意蕴和标志性符号,华夏族群、汉族、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共同记忆中的标志性符号。其演变脉络从最初的血缘认同到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最终涵盖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炎黄子孙概念之生成、演变,将炎黄记忆传统与当下炎黄记忆建构活动联系起来,使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有了充足的历史依据。作为炎黄学的研究对象,炎黄子孙既是炎黄记忆的主体,也是炎黄记忆文本;既是炎黄学的研究主体、炎黄记忆文本的创造者和建构者,也是炎黄学的研究对象。正所谓“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是如此的历史生成物”<sup>[16]6</sup>。

#### (四)炎黄遗存

历史生成且保存至今、用作炎黄记忆的人造物像或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之物,称之为炎黄遗存。目前所见的炎帝遗存史迹共5处: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记载,“神农本起烈山”,烈山即厉山,在今随州市北20公里之厉山镇。炎帝故里有神农庙、神农洞、神农碑、神农殿、神农泉等遗迹。另据《国语·晋语》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因以氏焉。”今位于姜水之滨的陕西宝鸡有炎帝祠、神农庙、姜嫄庙、姜氏城等。《帝王世纪》亦记曰,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今湖南炎陵县西17公里的鹿原坡有炎帝陵。另外河南柘城和山西高平亦有炎帝活动史迹留存。黄帝遗存史迹共3处:《大明一统志》记曰:“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坐落于新郑西南的具茨山风后顶之巔,至今尚有轩辕庙,石房三间,庙内供奉黄帝坐像,另有轩辕丘碑、炎黄二帝石雕像、轩辕黄帝塑像等历史遗迹。据《史记·封禅书》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sup>[15]83</sup>《纲鉴易知录·五帝纪》亦记曰:“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鼎成,崩焉,其臣左彻取衣、冠、几、仗而庙祀之。”地处河南灵宝市阳平镇东北5公里的黄帝铸鼎原,已于1987年5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帝铸鼎原至今还有始

祖殿、黄帝陵墓冢、轩辕黄帝铸鼎碑铭等历史遗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今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1公里处的桥山尚存黄帝陵、轩辕庙、人文初祖殿及历代碑刻等历史遗存。此外,炎黄群体活动史迹,还有河北涿鹿县涿鹿大战遗址、山西阳曲阪泉大战遗址、四川盐亭嫫祖故里、湖北宜昌嫫祖庙等。目前所见具有代表性的炎黄遗存,多为历代国家祭祀之所。另据历代方志所载,唐宋以后,全国各地出现很多用作纪念伏羲、女娲、神农、祝融、黄帝的三皇庙,用作纪念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五帝庙,还有许多分散各地的先农坛、先蚕坛、先医坛、传心殿等,这些也是地方或民间祭祀、祈福之所,同样是十分珍贵的炎黄遗存。被人们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之物,如河北涿鹿的蚩尤松、黄帝泉,陕西宝鸡的神农窟、神农泉,河南新郑的具茨山、鸳鸯台,陕西黄帝陵前的黄帝手植柏、湖南炎陵西北山巔的洗药池、四川盐亭嫫祖湖、陕西宝鸡清姜河、湖北随州的厉山等自然之物,也承载着丰富的炎黄记忆,如人们一提到厉山,就会想到神农出生的地方,有关炎帝记忆随即被唤醒,故这些自然之物亦可理解为炎黄遗存。

附载于炎黄遗存之上的历史信息,也是炎黄学的研究对象。荆山黄帝陵门前四棱柱纪念塔上雕刻的黄帝发明舟车、仓颉造字、嫫祖养蚕和黄帝率领部落征战的故事,意在重现人文初祖文明创建之功。轩辕庙院东侧的碑廊,以及书写在炎黄纪念建筑上的匾额、楹联、重修炎帝陵碑记以及镌刻在炎黄遗存之上的诗文,如商代伯夷的《采薇歌》、历代名人的《黄帝赞》、近人梁启超的《黄帝四首》等,表达的是炎黄子孙对祖先的歌颂、感激、追念之情。后人可透过纪念建筑、题留诗词信息和炎黄子孙追记始祖的祭祀场面,体悟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港澳台同胞清明节参祭黄帝陵的仪式、海外华人华侨参拜人文始祖黄帝的图片,以及黄帝陵前祭亭的香火,共同表达了全球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或国家认同。伫立在陕西黄陵的“香港回归纪念碑”“澳门回归纪念碑”等碑刻及碑文,记载的是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庆典活动,而炎帝祠九龙泉断碑诉说的是炎黄子孙历史记忆的断裂或伤痛。总之,附载于炎黄遗存之上的历史信息已不再是凝固的历史或自然之物,而是焕发着生命气息的历史回响,期待炎黄后裔的对话与理解。

#### (五)炎黄祭典

中国自古重礼崇祭,《礼记·祭统》有言曰:“凡治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炎黄二帝

“因有大功于世,自古至今多方享祭,形成传统”<sup>[18]1</sup>。依据历代祭礼而举办的仪式化炎黄祭祀活动称之为炎黄祭典。传承至今的炎黄祭典有炎帝祭典、黄帝祭典、太昊伏羲祭典和女娲祭典4种<sup>③</sup>,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特指炎帝祭典和黄帝祭典。

炎帝祭典包括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祭典、湖北随州市神农祭典和陕西宝鸡市炎帝祭典。史载炎帝神农氏在位120年崩,葬于长沙。《舆地纪胜》云“炎帝墓,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湖南酃县塘田乡鹿原坡),宋乾德五年(967年)始访得”,“建庙奉祀,以祝融配,置守灵户”<sup>[19]282-283</sup>。每年清明节朝廷遣员致祭炎帝陵。现今炎帝陵为1984年至1988年修复<sup>④</sup>,1993年8月15日,湖南省各界首次公祭炎帝陵典礼暨“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赛取圣火火种仪式,在株洲酃县塘田乡隆重举行。1994年酃县更名炎陵县,始有“南炎陵、北黄陵”之谓。自此每年清明节、重阳节均举行炎帝陵祭典。2006年炎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481X-33)。湖北随州的神农祭典主要是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神农诞辰日举行。相传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炎帝生于烈山。自2009年开始湖北随州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2011年“随州神农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宝鸡的炎帝祭典,官祭在神农生辰和忌日举行,民祭则每逢初一和十五,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编号:481X-33)。

黄帝祭典,包括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祭典、河南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祭典和浙江缙云县轩辕祭典。陕西桥山祭黄帝陵始于汉代,《史记》记曰:汉武帝元封十年,“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sup>[20]472-473</sup>。唐大历四年(769年),酃、坊等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祭典。次年,在桥陵修建黄帝庙。明洪武三年,朱元璋降旨修缮黄帝陵庙,祭祀黄帝自此不曾中断。1935年,国民政府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每年清明节国民政府均派代表致祭黄帝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至1963年恢复清明节致祭黄帝陵。<sup>⑤</sup>1980年始,陕西省各界每年清明节扫祭黄帝陵,2006年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典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480X-32)。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源自“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拜轩辕”之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即有“三月三拜轩辕”之习俗。自2006年(丙午年)“炎黄文化旅游节”之“拜祖大典”升格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每

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新郑举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08年河南省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编号:480X-32)。此外,浙江省缙云的轩辕祭典,每年之清明节和重阳节均有举行,亦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编号:480X-32)。

炎黄学的研究对象,炎黄记忆文本是广义的文本,特指炎黄子孙自炎黄时代创造并保存至今的文化表征。每一种记忆文本都有其对应或所表达的社会本相。以语言、文字、图片、音像、人造物像、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之物以及群体仪式活动、日常生活行为等形式保存的炎黄记忆文本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语言是人类叙述自身历史最古老的工具,炎黄传说便是炎黄记忆的最初形态。文字发明和使用之后,炎黄记忆被固定为书面形态,即炎黄文献。从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子孙到炎黄遗存、炎黄祭典等,大致可以归纳为炎黄记忆传统的历时性进程。炎黄记忆传统不仅是一个时间过程,还是一个空间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各种记忆文本之间的共时性特征:炎黄传说不以炎黄文献的出现而退出,炎黄文献亦不以炎黄遗存的产生而湮灭,各种记忆文本始终处于共时性存在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炎黄记忆文本的空间分布,如陕西宝鸡和湖北随州不仅都有炎帝故里,而且都有丰富的炎黄文献和炎黄遗存。当然,随着炎黄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积累,不仅会提炼出更多的记忆文本,而且各种记忆文本的内涵将更加丰富,如地方性和民间性炎黄文献,有可能成为炎黄文献的主体,因为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宝库”<sup>[21]</sup>。炎黄遗存和炎黄祭典也会更加多样化,如博物馆、艺术馆、传统地方戏曲等,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 三、炎黄学之学

炎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当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时,方可称之为学。炎黄学除应有其生成史的叙述、研究对象的界定外,形成与其研究对象性质相应的研究方法,以及基础性资料积累、标志性专门著作和课程体系设置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 (一) 炎黄学研究思路与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其研究对象性质相应的研究方法。按其功能划分,最少分为3个层次<sup>[22]491</sup>:居于最高层次的方法属于哲学层面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或称之为炎黄学研究的导向性方法;然后是炎黄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或称之为技术性方法;最基础性的方法是搜集和整理炎黄记忆文本的手段。在研究

思路,则是从最基础的炎黄记忆文本搜集与整理开始,然后进入一般性研究,最终从研究思路及研究目标中体现炎黄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炎黄记忆文本的搜集与整理,主要运用田野调查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由于炎黄学研究对象是保存至今的炎黄记忆文本,是依然活着的历史,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之中,真实可见,触手可及,决定了炎黄学研究的起点是当下现实社会。只有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才能从日常生活中、现实社会中搜集到如“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遗存”等鲜活多样的炎黄记忆文本。同时,保存至今的炎黄记忆文本,又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我们所闻所见的炎黄记忆,并非炎黄记忆本身,而是炎黄记忆留存的历史痕迹且大多是残缺的信息,它们更多的是存在于文献记载或遗址遗迹中的,只有借助文献学研究,通过实证的方法、考证的手段,还原历史真相,并逐步澄清各种记忆文本的基本类型、生成背景、演进或传播过程、保存状况及社会功能等客观性信息,才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分析文本。

炎黄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指在炎黄学范围内进行具体学科研究的操作方法或专业技能。包括分类法、综合分析法和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法。分类是对搜集或整理的炎黄记忆文本开展科学研究的第一道工序。只有对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中发现的原生态炎黄记忆文本进行科学分类,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分类法既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者学术旨趣的反映,比如分类原则和标准,直接反映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和对于学科性质的界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8卷本《炎黄汇典》基本上是以文献的体裁分卷,并不表达学科意义。炎黄学对于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中发现的原生态炎黄记忆文本,在整体把握其历史过程和空间过程的基础上,主要是按照炎黄记忆文本的生存样态及其功能进行分类。综合分析法,主要是运用相应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探讨各种记忆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找出蕴含其中的规律或生长机制,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历史的人类学研究,着眼点不在于确证各种炎黄记忆文本的客观性,而是追问其何时产生,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或以什么形式保存至今,既研究过去的建构如何用来解释现在,也研究过去是如何在现在被创造出来的。在具体操作上,主要是“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生存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从而“理解生活的意义”<sup>[23]6-7</sup>。

炎黄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坚持长时段不间断观察,即历时性研究,总体上归之为文本分析法,而不

是文献研究。文本分析与文献研究追求记忆符号所描述的内容及其是否客观真实不同,它以语言、文字(或图像、影视)符号所陈述的内容为表象(炎黄记忆文本),尝试探索此表象背后的本相,也就是探求此陈述、表述内容背后的社会情景<sup>[16]150</sup>。

## (二)炎黄学的课程体系

标志性专门著作、基础性资料积累和课程体系设置往往是一门学科成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与学问的根本区别。炎黄学标志性专门著作首先是《炎黄学概论》,其基本功能是向高校大学生系统介绍炎黄学。基本内容包括炎黄学核心概念如炎黄、炎黄学、炎黄记忆、炎黄记忆文本等概念的解析与界定;炎黄学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的提炼与概括,以及炎黄学与相关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之间的关系;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征的叙述与阐释,如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遗存等记忆文本的产生与保存;炎黄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从事炎黄学研究的方法、炎黄学的历史与现状(包括炎黄学研究机构、炎黄学研究成果等)及海外炎黄记忆等。

通过开办讲习班或在大学设系列课程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炎黄学学科建设主要依托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该院拟在信阳师范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炎黄学系列公开课程”,传播炎黄学知识,培养炎黄学研究人才,学科建设的方向是正确的。为更好规划炎黄学系列课程,2018年2月4日,炎黄学研究院邀请相关专家在信阳师范学院召开“炎黄学公开课备课会”。由于目前所见12讲“炎黄学公开课”,课程名称及内容仍在讨论中,在此唯报以美好期待。我们认为炎黄学课程体系应围绕炎黄学的研究对象展开建构,以炎黄记忆文本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其知识结构和知识品种,应符合培养文科大学生或研究生的知识特征,课程之开设及讲授能够达到传播炎黄学知识之效果和目的。如“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研究”“炎黄遗存”“炎黄祭典”“海外炎黄”介绍与普及及“炎黄学史”等,均可开设为炎黄学课程。与“炎黄学概论”课组成炎黄学的课程体系。

基础性资料积累,当从“炎黄记忆文本”的搜集整理入手。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编辑整理出的各类炎黄记忆文本,可作为炎黄学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基础性文献。搜集、整理和辑录炎黄学资料是炎黄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非常艰巨而细致的工作,可借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的《炎黄汇典》等已有成果,从炎黄学研究对象出发,

依炎黄记忆文本进行分类整理。

### (三)炎黄学的学科性质及特征

炎黄学是研究炎黄记忆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由炎黄子孙的记忆活动而生成的历时性知识建构而成的人文科学。由于研究炎黄记忆文本的生成、保存和传播,涉及范围广泛,与许多其他学科存在密切关系,因而炎黄学兼具科学与人文双重特征和跨学科特征,同时,炎黄学作为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亦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科学与人文双重性特征。学科性质及其特征,一般是由研究对象及其特征决定的。炎黄学以历史上生成并保存至今的各类炎黄记忆文本为研究对象,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其中,对过去的研究,包括各类炎黄记忆文本的生成、演变或传播等,它们都属于发生的过去,并不在场。我们研究的并不是炎黄记忆文本的过去,而是过去留存于现在的痕迹。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史实的确定与还原,以及过程的叙述,均需坚持实证的方法。“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在此意义上炎黄学的研究规范、操作程序、推理方式等,与其他自然科学几乎一致,因此具有科学性特征。我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确证各类炎黄记忆文本,运用考证的手段还原炎黄记忆文本的演变或传播过程,仅仅是炎黄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炎黄学研究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更重要的工作是要针对各类炎黄记忆文本的存续现状、空间分布、表达形式等现实存在,运用诠释的方法,解释它的当然和所以然,也就是发现和挖掘隐藏在现实存在背后的意义和文化价值。炎黄学在认识对象上的过去性和现在性特征,及其认识方法上的实证性和诠释性特征,决定了炎黄学兼具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特征。

跨学科特征。由于研究炎黄记忆文本的生成、保存和传播,涉及范围和研究领域极其广泛,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炎黄学因此与其他许多学科存在交叉。依学科依存程度而言,与炎黄学最为密切的是历史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最大区别是过去性,即研究对象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实际,炎黄记忆文本的创造与保存过程,也是过去的知识,同样具有过去性特征。不过,炎黄学的研究对象是保存至今的记忆文本,是一种现实存在,耳闻目睹,触手可及,而历史学以全部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以研究遥远过去的人类社会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为基本目标,因此与炎黄学又存在很大区别。其次是民俗学。民俗学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习

惯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炎黄记忆文本如炎黄传说、炎黄祭典等,同样是重要的民俗事象,也具有集体性、稳定性和传承性特征。所不同的是民俗学以活的民俗事象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现在的”学科;炎黄学以炎黄记忆文本的生成、演变或传播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历时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炎黄学也有密切的关系,两者都强调研究对象的空间过程,从遥远的空间了解人类的活动进程。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炎黄学只关注由炎黄子孙创造的炎黄记忆,彼此的研究范围存在较大差异。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发现炎黄学研究的时空框架和研究范围,但炎黄学不以考古发现为目的。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对炎黄学研究主体及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解释至关重要,但炎黄学中的炎黄子孙超越了近代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二者有所区别。炎黄学除与上述学科存在密切依存关系之外,在研究过程中,还会借助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炎黄学具有独立的学科性质,其他学科均无法替代。

时代性特征。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及炎黄学学科概念之孕育,伴随改革开放全过程。改革开放的历史与成就,可谓炎黄学生成的最大历史背景和时代性特征。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再次走向世界中心,极大地激发了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炎黄子孙强烈期待在多元文化的当今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并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从而引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sup>[24]</sup>,希望从中国经验、中国实践出发,建构中国学术话语,实现中国学术的本土化。炎黄学的时代性特征,还具体体现在炎黄记忆主体的空间分布和全球化趋势上,如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胞,与祖国大陆(内地)同胞同为炎黄子孙,或因政治阻隔,或因制度因素,而留存不同的炎黄记忆和时代痕迹,是古代中国未曾遇到的。由于祖国的强大激发出全球华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中华文化在全球华人中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由此汇聚而成的推动中国崛起的愿望,比改革开放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着力建构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任务。这一任务与改革开放以来炎黄记忆

传统的现代建构目标相一致,从而为炎黄学从学术之实的积累到学术之名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sup>[25]</sup>。炎黄学学科的生成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内在理路。

#### 四、结语

炎黄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力迅速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千多年炎黄记忆传统中发现的中国固有学问,也是从当下中国实际出发,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学问,可谓新时代的新学问。炎黄学研究的长时段不间断观察和历时性研究方法,把研究重心由炎黄记忆文本的“客观存在及其样貌”,转移到炎黄记忆文本的生成、记忆(遗忘)、被发现(或被选择)的生命史过程,从中发现保存至今的各类炎黄记忆文本是何时(何地)生成、为何(如何)保存至今,或为何(如何)被遗忘、又为何(如何)被发现。根据炎黄学的研究思路,从现实存在的炎黄记忆文本出发,追溯其生成、演变的历史过程,直至发现其生成源头,也即炎黄学研究的历史起点,然后从历史起点出发,顺述其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形成的学术话语,本质上就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叙事。与中国近代人文科学运用西方概念和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不同,炎黄学从中国历史起点重构的国家叙事,是基于中国本土经验、本土材料和本土元素,炎黄学研究将成为解释中华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的一把钥匙。

炎黄学作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学科,通过建构炎黄学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我们不仅可以在高校开设炎黄学系列课程,建构炎黄学大学课程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编写炎黄学幼儿读物,如黄帝传说、黄帝故事或炎帝传说、炎帝故事、炎黄传说等,在中小学历史、语文、道德与法治等相关课程教材中增加炎黄学的内容,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当然,我们还可以在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学者中开展炎黄学合作研究,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中外文化交流中增加炎黄学的内容。特别是通过宣传普及炎黄学知识、培养炎黄学研究人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组建炎黄学研究机构,积累炎黄学研究成果,形成炎黄学话语体系。这对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炎黄学的发展,除坚守自己的学科本位外,更重要的是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炎黄学的学科本位,就是文本分析法(王明珂称之为“反思史学”),包括文本及其文本结构的发现能力,挖掘文本生成语境的能力,文本表达的现实表征及其背后对应社会本相的辨别能力,以及文本分析程序的掌握能力等。学科建设的开放包容态度,首先是指研究对象的开放性态度。炎黄

记忆文本的类型和种类不是事先确定了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展,使种类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如此方能保证炎黄学研究常新常青,拥有不竭的动力。其次是指研究方法的开放态度。炎黄学本身具有跨学科特征,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除吸收借鉴与炎黄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主动吸收与应用,如对大数据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应用。

#### 注释:

- ① 1988年,刘源被选任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随即升格为河南省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并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刻制公章。
- ② 国家旅游局旅办字[1990]第1号文件。
- ③ 民政部民社批[1990]第77号文件。
- ④ 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章程》第四条 任务。
- ⑤ 郑州市计划委员会发文《关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计划书的批复》,郑计教字[1991]第12号文件。
- ⑥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黄遗存的整修、修建活动,见本文“炎黄学之实”之“炎黄遗存”部分。
- ⑦ 自2000年第九届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始,拜祖大典作为炎黄文化旅游节的主要内容。
- ⑧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炎黄祭典活动,见本文“炎黄学之实”之“炎黄祭典”部分。
- ⑨ 应邀参加“炎黄学学科建设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的与会专家有李宗桂、梁枢、刘庆柱、牟钟鉴、沈长云、王巍、王宇信、王震中、徐光春、张立文、周洪宇、张新斌等;另因事未能与会者有赵德润、张岂之等。
- ⑩ “炎黄学学科建设暨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邀请函”、“我校炎黄学研究院成立暨炎黄学学科研讨会在京举行”(2017年12月25日)和《炎黄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学科》,分别表述为国学、炎黄文化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⑪ 炎黄学研究院院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徐光春,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五届(现任)理事会首席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中,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三、四、五届(现任)理事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梁枢,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五届(现任)理事会副会长。另外,应邀参加“炎黄学学科建设暨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成立大会”者,刘庆柱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五届(现任)理事会副会长。鲁淳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三、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当日因事未能与会者赵德润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第四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第五届(现任)理事会特别顾问。张岂之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副会长。
- 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强化炎黄记忆符号方面,还于1991年创办纪实性月刊《炎黄春秋》,与炎帝陵基金会和黄

帝陵基金会共同主办综合性学术丛刊《炎黄文化研究》,举办“中华炎黄文化学术讨论会”“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炎黄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炎黄祭祀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学术活动。

- ⑬ 河北省涉县女娲祭典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86X-38)、甘肃省秦安县女娲祭典 2011 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86X-38)。甘肃省天水市太昊伏羲祭典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85X-37)、河南省淮阳县太昊伏羲祭典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85X-37)、河北省新乐市太昊伏羲祭典 2011 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485X-37)。
- ⑭ 1996 年,湖南省炎陵县炎帝陵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 78,分类号 22。
- ⑮ 1961 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陕西省黄陵县之黄帝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编号 162。《文物》1961 年第 4-5 期。

#### 参考文献:

- [1] 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M].顾 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3] 王仁民.大河魂[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
- [4] 乔志敏.黄帝故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5]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黄帝故里——新郑[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 [6] 亿 里.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郑古都与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239-242.
- [7] 戴松成.文化河南策划规划十八案(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 [8] 沈文慧,朱国伟.炎黄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学科[N].光明日报,2018-01-20(11).

- [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 [10] 金宇飞.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J].复旦学报,2003(3):102-108.
- [11] 许 钰.黄帝传说的两种形态及其功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4):7-11.
- [12] 西佛曼.走进历史田野[M].贾士蘅,译.台北: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 [13] 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14]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5] 王贵民,杨志清.炎黄汇典·史籍卷[G].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 [16]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7]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8] 曲英杰.炎黄汇典·祭祀卷[G].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19] 罗 琨,赵嘉朱.炎黄汇典·方志卷[G].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 [2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1]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J].东南学术,2004(增刊):293.
- [22]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23] 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24] 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J].清华大学学报,2016(2):5-16.
- [25]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006).

## Modern Expression of the Tradition Memory about YH-XD

—Introduction to Yhxdology

YIN Quanha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Just like other Chinese traditional science, this study, concerning Yandi and Huangdi, or YH-XD, two Chinese ledged emperors, belongs to the research category of the memory about them, starting quite long before its scientific name Yhxdology came into being. Yhxdology, the modern and the latest expression of the tradition memory about YH-XD, originated from the recall and study of the portraits and rites of YH-XD and matured with the course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YH-XD, the iconic mnemonic symbol of Yhxdology, gave birth to kinds of texts and records, such as the legends, documents, historical sites and rites, which later become the objects of study.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Yhxdology deals with not only its definition, history, methodology, but also the accumulation of basic data, its symbolic monographs and its curriculum system settings.

**Key words:** Yhxdology; memory about YH-XD; tradition memory about YH-XD; document

(责任编辑:蔡宇宏)